

体育运动

从政治、社会与教育诸方面
看体育运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本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的材料和观点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教科文组织无涉，而由作者负责。

除插图及保留翻译权及翻印权者外，文章不限制翻译与翻印，但须注明作者及来源。有关本刊编辑或订阅事务的信件，请交：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编辑部或发行科。

编辑者：《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编辑部 北京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发行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印刷者：北京新华印刷厂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 1.40 元

一年四期 5.60 元（平邮）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第1卷第2期 (1984年6月)

体育运动

编者的话 3

运 动 与 政 治

杰弗里·考德威尔	国际体育运动与民族意识	5
京特·吕申	体育运动与冲突和解决冲突	17
R·斯托克菲斯	体育运动组织：保守与进步的不同抉择	29

运 动 与 社 会

J·A·阿德德纪	社会变革与非洲体育运动中的妇女	41
伯纳德·F·布思	竞技、运动及社会自我调节	51
尚塔尔·马朗方	法国体育运动经济学	65
彼得·马什	英国足球看台上的社会秩序	79

运 动 与 教 育

何塞·马利亚·卡希加尔	通过人体运动进行教育	89
J·塞缪尔·约翰逊	体育运动与心理调节	105
库兹涅佐夫	人的潜在能力与“人类极限学”	109
皮埃尔·瑟林	运动实践与体育	1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体育运动国际宪章”	135

公 开 论 坛

J·P·布蒂内	人文科学和社会实践	143
---------	-----------	-----

社 科 领 域

拉尔夫·亚当	能使社会学知识的传播更为有效吗?	159
赵复三	社会科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177

编者的话

运动是一项普遍性活动，它深深地植根于文化和人类社会诸模式之中。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先是赫伯特·斯宾塞对体育进行研究，后来又有格奥尔格·西梅尔及麦克斯·韦伯诸氏的著作，运动于是正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之一。这几位都是社会学的先驱，而人类学家则致力于研究竞赛在所谓原始社会中的社会文化功能。

但是，这些研究还是相当零散的。本期 R·斯托克菲斯的论文对运动的制度化和管理作了某些分析，但是这个问题在运动社会科学中还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人们认为，直到 1938 年，约翰·惠辛加发表他的著作《运动的人》，这才是把对运动的社会学分析加以系统化的初次尝试。^①到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学协会”内部成立了“运动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门学科才有了国际性的正式组织。该委员会现任主席京特·吕申协助筹备本期专辑，除自己撰文外，他还组织其他文稿，推荐作者，我们特在此表示感谢。

此外，1966 年以来在华沙出版的《运动社会学国际评论》对这门分科的发展亦颇有贡献。其他学科，诸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也对运动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期发表的尚塔尔·马朗方、伯纳德·布思、J·塞缪尔·约翰逊的文章即属此类。

也许是由于专业性机构成立较晚，对

运动的研究似乎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正如巴巴拉·B·西特和卡德尔·K·雅各布森的“社会学建设：社会学各分支在北美的地位”（见本刊英文版 1976 年第 18 卷第 2 期 391—395 页）一文所表明的，在社会学的三十六个分支中，关于运动的社会学，同关于闲暇、娱乐和艺术的社会学一样，受重视的程度名列第三十五位。当然，这种现象与这门分支缺乏足够数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很有关系。京特·吕申的论文指出，在有关的各学科中，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运动科学在内，到 1978 年底，全世界大致只有八十二位专家全力以赴地研究运动问题。

当然，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论，这种落后现象并不是罕见的。但是，鉴于体育运动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由于新闻界大肆宣传而益形突出，研究工作的落后状况便似乎令人费解。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知识界对于把体育运动列为研究课题多少有些轻视。这种态度可能有各种原因，例如，某种哲学和宗教的传统观念把心智和身体错误地分割开来；或者由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已经变成供观赏的节目，受到商业利益的支配和污染，因而失去其纯洁与尊贵。但是，难道这些能成为对它忽视的充分理由吗？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说过：“人们所要考虑的并不完全是观赏性运

动比赛。运动是文化性活动，是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最后几种方式之一。”^②

事实上，在诸如加拿大的因努伊特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图人社会里，竞技运动的教化、教育和交流功能是十分显著的，而在工业社会中，这些功能也还没有完全被商业利益引入歧途（见布思的论文）。京特·吕申以不同的例证说明运动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以及运动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杰弗里·考德威尔则分析了运动、特别是板球、对于形成澳大利亚民族性所起的作用。至于发展中社会，J·A·阿德德纪的文章则说明了运动与非洲妇女社会地位变革之间的联系。

竞技与运动毕竟一直发挥着社会文化方面和教学方面的重大功能，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从公元前776年开始至公元后393年，每四年举行一次，延续十一个世纪；后来在中断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从1896年起又恢复举行。人类的各种制度能象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历时悠久的还不多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激烈的“苏尔球”比赛，这是现代橄榄球的前身，它在中世纪的法国青年中曾风

靡一时，成为农村冲突的一种模拟战和发泄暴力的游戏。^③彼得·马什的文章分析了隐藏在英国足球爱好者的斗殴行为后面的某种社会秩序，认为运动场的看台是青年人发泄集体失意感的场所；除此之外，社会上便没有什么其他合适的地方了。

本专辑最后一组文章讨论体育（卡希加尔和瑟林的文章）以及介乎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那些研究课题，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智力和体力（见库兹涅佐夫的文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提倡体育和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们参加体育运动，本期全文发表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请读者注意赵复三关于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情况的论文，以及拉夫·亚当的关于社会学知识传播问题的文章（这是本刊经常刊登的课题之一，见1974年英文版第26卷第3期发表的“社会科学的传播与扩散”一文），和J·P·布蒂内的关于人文科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

阿里·卡赞西吉尔

（冯炳昆译）

Notes（注释）：

1. Günther Lüschen, 'Sociology of Sport: Development,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Ann. Rev. Sociol.*, No. 6, 1980, pp. 315-47.

2. Michel Serres, *Genèse*, p. 96, Paris, Grasset, 1982.

3. Jean-Michel Mehl, 'La soule ou le jeu de la guerre', *Le Monde Dimanche* (Paris), 24 January 1982.

国际体育运动与民族意识

杰弗里·考德威尔

在七十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局动荡不安之时，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曾说过，他的党一旦执政，希望澳大利亚人不再去理睬报纸头版那满篇关于政治角逐、丑闻、互相指责的报道，而把兴趣转向刊登在最后几版的体育消息。

尽管弗雷泽先生的讲话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澳大利亚应当重新复归正常状态

上——体育运动应当比政治活动更受群众的重视。

在大多数国家中，大部分居民很可能认为体育运动比政治活动更吸引人。另外，许多澳大利亚评论家还着重指出，体育运动在塑造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意识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着手以更集中、更精密的方法，考察体育运动过去和现在对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所作出的贡献，探讨体育运动的

价值体系、体育活动的结构组织和发展，以及影响体育运动的社会变化。本文拟讨论体育运动在民族意识发展中的作用，着重谈谈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苏联的一些情况。

体育运动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发展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属于派生性文化的国家。1788年英国人开始在这里建立殖民地；1901年，澳大利亚才正式建国。有人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澳大利亚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而没有活力，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时，澳大利亚以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明确的方式力图摆脱这种监护，建立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这种要求从心理上脱离英国的愿望导致了相当激进的立国思想。澳大利亚人希望建立一种相反的模型，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助成了这一点。

体育运动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居民中引起如此强

烈的兴趣，其原因尽管不完全清楚，但气候温和与场地方便，无疑是两大关键因素。临近十九世纪后半叶时，要求发展本国文化的愿望在运动场和战场上得到充分的表现。正如唐纳德·霍恩所说，从事体育活动和作战是澳大利亚人表现民族意识的两种主要方式^①。澳大利亚人在国际体坛和战场上可以努力表明，他们即使不比别国

杰弗里·考德威尔，堪培拉国立澳大利亚大学进修教育中心高级讲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澳大利亚全国委员会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本刊驻澳通讯员，就闲暇、体育运动和赌博问题发表过大量著述。通讯处：Mr. Geoffrey Caldwell, Centr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人更强,至少也不相上下。他们开始接受这样的见解:如果在国际体育比赛和战争中表现得出色(不论输赢),那么只要把精力用到其它领域上去,自然也能干得漂亮。因此,运动场、英布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便都成为考验澳大利亚人气质、胆量和体能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人把战场和体坛看成是检验本国价值的最适当场所,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现住澳大利亚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比尔·曼德尔所指出的,国际体育运动的兴起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这两件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即欧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后,决不是偶然的^②。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爆发和国际体育运动的繁荣,是同一棵树生长的果实。J.O.佐勒引用了康拉德·洛伦茨的一句话,体育运动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③朔伊希认为,利用国际竞赛显示本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东西方国家的共同现象。他还认为:“作为国家生活质量的一种标志,体育运动往往盛行于那些当政者具有某种自卑感的国家”^④。

关于体育运动与国家声誉的一般问题留待下文再谈,在这里有必要仔细探讨一下体育运动如何成为形成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主要力量。在英联邦各国,板球也许是公众最感兴趣的运动,它对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形成有过重大贡献。曼德尔热衷于撰写有关体育运动问题的文章,板球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所起的作用是他的研究课题之一。他指出,尽管其他运动员,如划艇运动员、拳击运动员、摔跤运动员和射击运动员,有时也同外国运动员进行比赛,但板球却是历史悠久的国际竞赛项

目。由于板球是以英国为对手的集体竞赛项目,因此这种比赛便成为两个民族进行较量的象征^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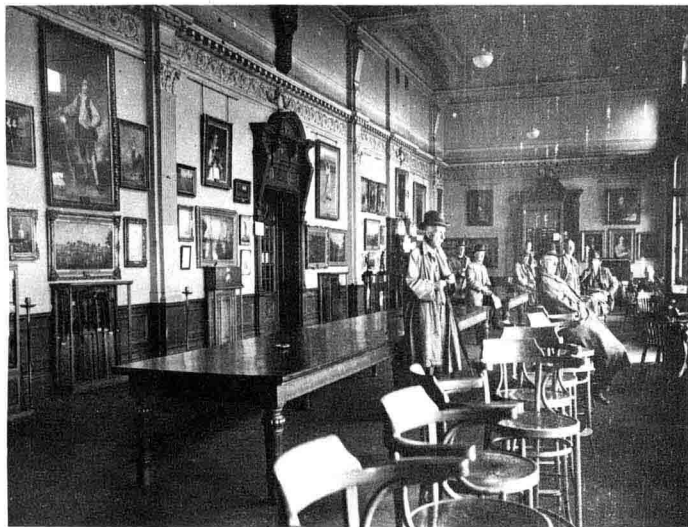
曼德尔将十九世纪澳大利亚板球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两个英国板球队访问澳大利亚时,殖民地居民对他们十分谦卑而恭敬,承认自己缺乏经验,承认英国球员技艺高超、经验丰富,他们把英国球队的来访看成是自己向内行学习的机会。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殖民地居民认定他们的板球水平已经提高到有可能击败板球发源地的英国人,结果真是如此。澳大利亚板球队员取得了胜利,“受到了欢呼,澳大利亚人感到这表明自己不论在板球场内、还是在本国的体育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宽广的领域中,都不必因血统关系和身居赤道以南而自觉低人一等了。”^⑥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这个时期,人们对于英澳两国之间板球比赛的含义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战胜英国人显示了澳大利亚人的能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澳大利亚人打英国板球这一事实就表示他们具有基本的“英国素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亚板球队曾前往英国比赛,但由于比赛失败,澳大利亚队员的雇佣作风又遭到批评,妨碍了澳大利亚板球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发展。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重大比赛连连获胜,使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和民族信心恢复了元气,而且被用来支持以下的论点:建立澳大利亚殖民地联邦无疑将带来好处。曼德尔指出,十九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地认为在显示男子气概的运动项目——特别是板球中表现的才能,反映着民族的优越性。他写道:



英国板球的堡垒：伦敦马里勒伯恩板球俱乐部爵士板球场的长厅。英国官方图片。

从一些表现了英国沙文主义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板球作为民族力量和精神价值的标志，具有多大的分量。1857年10月号的《评论季刊》曾经以赞赏的口吻把打板球的英国公学学生同脸色苍白的德国学生以及学业负担过重的法国综合工学校学生加以比较。英国人丝毫不怕他们，因为英国人从板球赛中锻炼出“胆量、血气和健壮的腰腿”。查尔斯·博克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写道：“譬如说，谁能想象，臀部肥大、反映迟钝的荷兰佬会有本事去追球，或是把球打得象一发发炮弹似的，并且能跑得象獐子那么快！这岂非异想天开！至于天朗气清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虚弱无力的居民，他们准会宁可面对队列严整的英国步兵方阵，而不会乐于迎击第一流的投球手投过来的板球。要抵挡这样的球，他们靠的将不会是

球棒，而是自己的后背。”

另一位作家认为，怀疑板球带来的幸运便无异于怀疑生而为英国人的幸运。菲利普·特雷弗少校曾经说过，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对板球毫无兴趣，那末一般说来，你总会发现他性格中有某些非英国的东西^⑦。

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关于板球的著述中没有提出这样过分的主张，然而，几乎没有疑问，澳大利亚分享的这种文化确实把体育运动——特别是板球——视为对一个国家真正价值的检验。

明显的证据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英澳板球比赛（称为“决赛”），有助于澳大利亚从心理上脱离英国。确实，两国关系从来也没有象1932—1933年英、澳板球赛后那样别扭过。当时，英国球员多次使用



危险投球动作。快速的英国投球手们想制服厉害的澳大利亚击球神手唐纳德·布雷德曼，他们不是朝三柱门投球，而是对准这位击球手投球。澳大利亚人认为要这种手法完全是不正当的，对英国人的忿恨情绪因此而高涨。

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BC）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了这种板球的民族性。自从收音机以及电视机出现以来，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对澳大利亚境内举行的每一场板球决赛都进行全场实况转播，最近五年来还转播了在英国比赛板球的实况。

甚至在笔者撰写本文之时，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正从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在广播和电视中播放澳大利亚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五天板球决赛全日比赛实况。1981年夏，一共播送了六次为期五天的板球决赛以及一些国际一日赛，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就是这样把澳大利亚同外国竞赛的场

面传送到全国的每个角落。由于大量忠实观众的赞赏和支持，板球决赛在全国成为一种特别热烈的戏剧性表演，或者称之为“运动舞台”。

但澳大利亚人所以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运动家，并不仅仅是根据板球比赛中取得的胜利。板球是建立民族信心的主要运动，但其他项目中获得的胜利也起了作用。二十世纪的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澳大利亚人在网球、高尔夫球、软式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重大国际比赛中都曾赢得过冠军、锦标和荣誉。只是在七十年代，他们才感到在国际比赛中获胜比较困难了。

在澳大利亚短短的历史中，澳大利亚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热衷于体育的大国，这些想法成为发展民族意识的重要基础。关于澳大利亚人对于体育运动具有非凡热情的说法，通常的依据是参加和





速写三幅：本世纪初在英国比赛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D. R. 作。

观看体育运动的人十分众多，或是取得世界冠军称号的男女运动员多得异乎寻常。例如，著名美国体育杂志《体育画报》1960年声称，澳大利亚是一个“人人参加运动、人人观看体育比赛、人人谈论体育消息、举国上下热爱体育运动的国家，真是世所罕见。”^⑧霍恩认为，体育运动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它已成为一种国教，如果不观看或者不谈论体育运动，就不成其为澳大利亚人了^⑨。

1964年，迈耶对澳大利亚报纸内容的分析表明，体育消息占的篇幅超过了其他任何新闻报道^⑩。谢泼德也指出，每天有这么多报纸不惜挤掉刊登重要新闻的篇幅来刊登最新的体育消息，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见不到的^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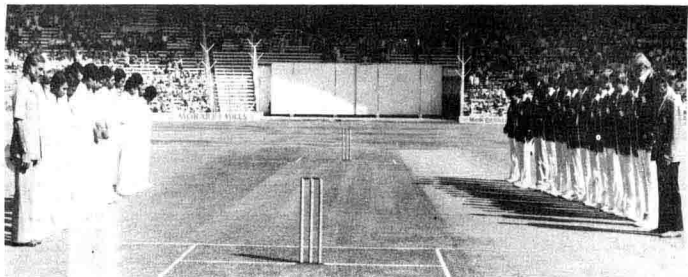
1962年，《体育画报》对在四十项主要运动项目中赢得前三名的国家作了一次调查和评定，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按五分、三分和一分评分。结果共有三十四个国家得分，澳大利亚所得的分数仅次于美国、苏联、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名列第六。而如按人口平均来衡量，澳大利亚更是稳居第一位^⑫。

加拿大参加集体项目 国际比赛的情况

对于加拿大体育运动结构的某些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就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加拿大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并取得成就对于形成民族意识的作用远不及澳大利亚。在加拿大体育界，地方主义势力、商业界对职业性体育运动的控制、国家队的选拔方法、以及对美国式运动的重视超过对英国式运动的重视等等，都阻碍了加拿大体育运动的团结和民族统一性这二者的发展。

尽管加拿大人也热爱体育运动，但他们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象澳大利亚人那样频繁地参加集体项目的国际比赛。加拿大最流行的运动项目是职业性冰球、加式足球和棒球。但是，除冰球外，其他两个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国际性比赛。而且，职业队的国际冰球赛，也只是最近十五年来才开始出现。职业冰球队、足球队和棒球队掌握在企业家和商人手中，而这些人通常将利润置于民族意识之上。加拿大球队参加本洲的地区性冰球和棒球赛区，这些赛区不以美国与加拿大的国界划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球队不能相遇。加拿大和美国每年都选拔最佳足球队和棒球队，不过有名无实。因此，北美洲职业体育运动组织即或能激发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忠诚，但却无补于对国家的忠诚。

回顾一下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之前加拿大选拔国家业余冰球队的方式，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一个球队如果战胜了其他城镇的球队，便赢得了代表加拿大参加国际比赛、特别是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权利。1920年代表加拿大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是温尼伯福尔肯斯队，1924年是多伦多格兰尼茨队，1928年是多伦多格拉兹队，1932年是温尼伯队，1948年是加拿大皇家空军队，1952年是埃德蒙顿默丘里斯队等等；这种选拔制度对于体育运动民族性



在印度举行的一场板球赛的开幕式。印度驻法国使馆图片。

的发展没有多大促进作用。某个城市的球队取得代表加拿大比赛冰球的权利，一般会激起本市居民的强烈兴趣；然而远离这座城市的其他居民是否也会感同身受，就很难说了。澳大利亚选拔国家队的制度完全不同：无论哪一种运动的国家队，都是从全国的运动员中选拔队员。这种方法肯定更能引起全国的兴趣，特别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公布组建国家队队员名单的时候。

七十年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奥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上的成绩

在加拿大举行的197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78年英联邦运动会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被迫重新估价各自的体育运动水平。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加拿大从上届的第二十一名跃居第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澳大利亚只得到了五枚奖牌，而且没有一枚是金牌。这种结果引人注目地表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奥运会强国，业已衰落。特别是同二十年前在墨尔本奥

运会上取得的成绩相比，更是如此。当时澳大利亚获得二十五枚奖牌，其中有十三枚金牌¹³。

七十年代，澳大利亚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加拿大却在上升，特别是在游泳和田径等主要项目方面。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兴衰的原因及其对民族意识的影响。

看一看澳大利亚人对于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失利的不同反应是很有趣的。联邦政府决定对本国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的表现进行一次正式调查，并全面地检查政府在体育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报纸社论（《时代报》，1976年7月27日；《澳大利亚人报》，1976年7月28日）认为，政府的作用不应是给尖子运动员发津贴以便刺激他们争夺金牌，而是应“保证为广大群众提供尽可能好的体育运动设施”；一些读者来信也响应了这种意见。另一些人则强调参加竞赛并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比赢得胜利更为重要；全国不必为奖牌得的少而垂头丧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种早期选拔和训练尖子运动员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还有一些读者来信表示了



冰球：多伦多枫叶队对蒙特里尔加拿大队。鲍勃·托马斯（SAM 供稿）。

相反的意见，认为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以恢复澳大利亚体育大国的地位。

加拿大的体育实力增强而澳大利亚实力减弱，这一点在 1978 年加拿大爱德蒙顿

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加拿大成为最强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则失去了往常第一名或第二名的地位。

七十年代，两国政府都得出了结论，

认为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获胜、特别是在奥林匹克一类的体育盛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确实有助于一个国家在国内外的威望。但若想取得这种成功，就需要更多的财力和物力，这不是业余体育俱乐部或组织所能负担得起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都制定了计划，要提高运动员在国际竞赛中的成绩；还鼓励群众参加一般体育活动，以促进健康水平。加拿大保健和业余体育运动部部长约纳·坎帕诺洛在加拿大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中说：

本政府的目的在于保证，无论参加哪一级比赛的运动员都被视为富有生产性的、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成员……务必使体育运动、保健和文娱活动都被社会公认为加拿大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能再认为运动员无非是汗流浹背；不能再贬低体育的学术地位。不要再把艺术家和运动员截然分开。运动员就是艺术家，有些艺术家也是运动员^[1]。

看来，加拿大得出这些结论，要比澳大利亚为早。实际上也是如此。在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加拿大保健和业余体育运动部的建立，就采取了种种重大步骤。该部有两个业务机构：一个是加拿大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重点是提高国家级和国际级竞赛的能力，同时严格遵守奥运会关于业余体育运动的规定；另一个是加拿大文娱委员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加拿大人进一步普遍参加各种体育和文娱活动。

加拿大体育运动委员会主持制定的“比赛计划”，是由政府资助推行的最引人注目的计划之一。“比赛计划”制订了有关鉴定人才、资助运动员、培训体育教练和干部、以及加拿大运动员在国内外比赛中

应达到的目标等问题的方案。通过这项“比赛计划”，加拿大体育运动委员会还制订了一项资助运动员的方案，以便提供生活费、训练津贴、误工补贴、学费和装备费、教练费、以及为第一流运动员租用设施的费用等等。

这种资助方案是长期性的，与诸如英联邦运动会等特定比赛无关。然而，这些计划的周期性与四年一度的奥运会赛期相适应。直接资助只发给经全国体育运动管理机构推荐的运动员。只有那些符合特定标准的、即名列或有可能名列世界前十六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获得这种资助。资助的目的是减轻由于参加竞赛或训练而失去就业机会所造成的经济困难。

在1978—1979年度，符合条件并获得资助的运动员人数为755名，分属于二十八项运动。这些资助都是根据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联合会制订的有关业余运动员地位的规定而提供的。得到资助的运动项目都是奥运会、泛美运动会和英联邦运动会设有的。

保健和业余体育运动部向加拿大体育运动委员会及加拿大文娱委员会提供的经费，来自在加拿大全国发行的彩票“加拿大大奖券”，由此所得经费的百分之五用于体育事业作为有关的政府机构的预算基金。澳大利亚政府的安排大体与此相同，但开始较晚。

这两个西方国家为了提高国家威望和加强民族地位而在发展体育运动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则又相形见绌。实际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只是最近十年来才在体育运动方面采取认真的措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期间，澳大利亚选择体育运动作为民族意识的基础，并不是出于政府的主动，而是发自民



回力球，巴斯克人的民族体育项目。杜卡塞摄影/拉福图片社（Rapho）供稿。

间。分别生活在六片殖民地上的澳大利亚人，希望建立一个与英国有所区别的国家，这种区别主要不在经济或政治方面，而是在社会方面——在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社会阶级关系方面不讲求甚至铲除某些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

苏联的体育运动

詹姆斯·顿尔登对苏联体育运动的发展作了认真的分析^⑮。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两大敌对阵营和军事集团，运动场已变成国际竞争的舞台；在苏联所谓尖锐对立的世界两大体系——

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中，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认为自己的体育运动实力雄厚，足以在世界上进行较量，赛赢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显示出苏维埃制度的生命力。苏共1949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体育运动的决议中指出，苏联男女运动员必将“于不久的将来，在主要的运动项目中取得世界领先地位”^⑰。

1957年，苏联是这样说的：

苏联运动员在体育运动方面所取得的越来越多的成绩，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每一次新的胜利都是苏维埃社会体

制和社会主义体育制度的胜利：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文化优越于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⑮。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苏联的体育运动协会就开始加入有关的国际体育运动联合会，苏联运动员也开始参加国际比赛。1946年至1958年期间，苏联加入了三十个国际联合会，到1973年时苏联已是四十二个世界主要体育运动联合会的会员国。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几年，苏联运动员如果没有获胜的相当把握，是不能获准参加国际比赛的。

苏联在同奥运会久违四十年后，于1952年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上首次亮相。苏联在奥运会的各项比赛中取得了大量优异成绩。如赖尔登所说，1956年奥运会上的胜利使许多苏联人“为他们的运动员感到骄傲，进而为他们的国家、以至为造就这些世界纪录创造者的制度感到骄傲。”根据1957年4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项命令，将近一千名苏联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干部被授予国家的几种最高嘉奖和荣誉。有二十七人被授予列宁勋章——苏联最高的奖赏。对苏联运动员说来，一千名体育工作者1957年所获得的那样崇高的荣誉是空前的^⑯。

苏联和东欧在1972年奥运会上取得胜利后，《真理报》热烈地夸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和兄弟国家的重大胜利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社会主义为人类达到体能和精神的完美境界提供了最充分的机会”^⑰。

但是，如果以为苏联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苏联政治和经济的优越性，那就错了。据赖尔登说，苏联同外国的体育比赛大多数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举行的。譬如，

1971年苏联对外体育交流中有67%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体育交流的主要原则是“发展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兄弟关系——它们领导着体育运动并为全国性体育组织规定对外政策任务”^⑱。因此，从苏联的立场来看，通过体育运动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体化，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属于苏联的体制和政策，保持和加强苏联在集团中的领导地位。^⑲

结 论

有必要对体育在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进行更详尽的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而且广度上要超过本文研究的范围。然而，本文所提到的情况已经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殖民地国家可以凭借体育运动建立一种与殖民国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意识。

新的或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利用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取得的成绩，对内对外证实该种制度的价值所在。

力争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取胜也许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地位还不稳定的一种证明。一个国家日益成熟（或趋于稳定）的标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体育以外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成就，如艺术、外交或各种工作中的长处，即发明创造、追求进步、企业才能、想象力等等。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谈谈民族意识及民族威望问题与战争和体育竞赛的联系。前已指出（他人也有这种看法），国际体育运动可以视为国际战争的替代物。非常明显，随着国家日益富裕、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技术越来越发达，会有更多

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和技术知识用于准备国际战争和争取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夺取胜利。不择手段、过分热忱和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赢得胜利,往往是现代化国际体育运动的特点。然而,较之用毁灭性的、残酷的、愚蠢的和丧失人性的

另一种手段——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或威望等问题,前者的代价便是微小的了。人类未来的和平也许有赖于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历久不渝而且富有意义的方式组织国际体育运动。

(徐壮飞译)

Notes (注译):

1. Donald Horne, *The Next Australia*, p. 157,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70.
2. Bill Mandle, *Winners Can Laugh, Sport and Society*, p. 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3. Joseph Othmar Zoller, 'Sport,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German Tribune Quarterly Review*, No. 20, 16 November 1972, p. 14.
4. Erwin K. Scheuch, 'Sport and Politics', op. cit., p. 1.
5. Bill Mandle, 'Cricket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 D. Jacques and G. R. Pavia (eds.), *Sport in Australia. Selected Readings in Physical Activity*, pp. 46-72, Sydney, McGraw-Hill, 1976.
6. Ibid., p. 47.
7. Ibid., p. 48.
8. H. R. Wind, *Sports Illustrated*, No. 16, 23 May 1960.
9. Donald Horne, *The Lucky Country*, pp. 157-9, Melbourne, 1964.
10. H. Mayer, *The Press in Australia*, Melbourne, Lansdowne, 1964.
11. J. Shepherd, 'Sport', in R. Brasch et al. (eds.), *This is Australia*, p. 341, Hamlyn/Dee Why West, 1975.
12. 'Which is the Best Sports Country in the World?', *Sports Illustrated*, 23 April 1962, pp. 28-30.
13. It is recognised, of course, that the hold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by a country boos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in Olympic events and, coupled with familiarity with local conditions, ensures a higher medal tally.
14. Quoted in *Image Canada*, Vol. 3, No. 4, 1978, p. 22.
15. James Riordan, *Sport in Soviet Society. Development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 3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 Ibid., p. 400.
17. Ibid., p. 364.
18. Y. D. Kotov and I. I. Yudovich, *Sovetskaya Shakhmatnaya Shkola*, p. 4, Moscow, 1951.
19. Riordan, op. cit., p. 369.
20. *Pravda*, 17 September 1972, p. 1.
21. Quoted in Riordan, op. cit., p. 379.
22. Ibid., p. 380.